

巴黎塞努齐博物馆 早期中国青铜器搜集相关资料考察

屈小玲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成都 610068)

摘要:法国巴黎塞努齐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以搜集中国青铜器著称。该馆创始人塞努齐1871年底至1872年初与友人前往日本和中国游历,留下在北京搜集中国青铜器的文字记录,见证了清末中国民间青铜器文物市场。塞氏的青铜佛像搜集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毁佛废寺的时代风潮,并因此对巴黎吉美博物馆创始人确立搜集亚洲宗教文物的思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键词:塞努齐;塞努齐博物馆;北京搜集青铜器;青铜佛像;亚洲佛教文物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091-06

以创始人亨利·塞努齐(Henri Cernuschi 1821—1897,后文简称塞氏)命名的巴黎塞努齐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专事收藏中国文物,尤以早期青铜器著名。这是塞氏1871年10月至1872年6月与其同伴Théodore Duret(后文简称Duret)在日本和中国游历时的文物搜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塞氏以中国青铜器收藏家闻名东西方,被视为19世纪下半叶开西方民间中国文物搜集先声^①,并被誉为西方青铜器搜集第一人^②。根据有关塞氏的传记资料介绍,塞氏在1871年与其同伴Duret前往日本和中国游历之前,两人并非艺术品与文物收藏的圈中人。塞氏是1848年流亡巴黎的米兰共和国国民代表,后来在巴黎成了金融家。Duret是艺术评论记者,两人参加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活动。巴黎公社失败后,两人为了暂避风险,遂离开巴黎而有远游东方之举^{[1]11—12[2]197}。他们先往墨西哥,尔后展开了亚洲之旅。两人于1871年10月抵达日本横滨,考察了神户、长崎、东京、大阪、奈良和京都诸个城市,搜集了一些日本青铜器、日本浮世绘以及工艺

品,于1872年2月离开日本登陆上海,展开了中国之旅。最后从广州南下沿途游历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归程经印度洋、苏黎世运河在马赛上岸,于1873年1月回到巴黎^{[3]23—31}。

塞氏搜集中国青铜器的年代尚未涉及中国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考古发掘,他在中国以什么方式搜集青铜器?塞氏搜集之青铜器在法国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考察的是他们的中国北京之行,并涉及与之相关的日本和巴黎社会,以供有关研究参考。

一 塞氏在北京搜集中国青铜器的记录

塞氏同伴Duret作为记者,沿途写下了俩人东方之行的游历札记,回巴黎后于1874年以《亚洲之旅》(*Voyage en Asie*)书名出版^③。Duret在有关中国之行的札记中叙述了他们在扬州、南京、武汉、天津、北京、热河与内蒙古的游历,从中了解到他们对中国南京古老城墙和武汉陈旧的官署衙门的印象,以及在内蒙地区访问喇嘛教寺庙和蒙古包牧民的行踪。他们在北京的活动以搜集中国青铜器为主,书中有专章描述,这是本文据以考察的重要资料之

收稿日期:2011-06-21

作者简介:屈小玲(1955—),女,四川开江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一^[4]。根据 Duret 游历东方一书的记载,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搜集中国青铜器:

我们在日本搜集了一批日本青铜器之后来到中国,继续我们的青铜器搜集之旅。在上海、扬州,我们分别有所收获,但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古玩市场是在北京,如同日本是在东京[Yedo:古名]一样。

两人在北京琉璃厂目睹了中国文物市场的繁荣,琉璃厂遍布青铜器、瓷器、玉器和漆器商店:

北京的古玩市场很多,特别是在中国城[琉璃厂],几乎占了整整两条街。沿街都是古玩,青铜器、瓷器、玉器和漆器商铺,店主很懂得他们所拥有文物的准确的年代、风格以及价值。当一件稀有的古董出现在某个商铺里时,所有的玩家都能马上得知消息。虽然没有拍卖行,但商人懂得怎样把那些玩家置于竞争之中。中国玩家和欧洲外交使团的公职人员都喜欢光顾这些古董商店,难免有竞争。在这种时候,那些古玩爱好者常常为了一件瓷盘、一些青铜器以及古老而刻有铭文的古乐器青铜钟争论不休。

这段记录提到了北京琉璃厂喜欢光顾古玩店的顾客,主要是“中国玩家和欧洲外交使团的公职人员”。1870年代的中国已经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因鸦片战争的开启,西方英法德美等列强国家进入中国,并在北京设立了外交使团。传统上,西方早期外交官多为贵族出身,因此大多有搜集文物和艺术品的文化趣味。诸多国家文化艺术最早的异国亲睐者大多是外交使节,Duret 文中提到的北京外交使团的公职人员就是典型的一例。

接下来 Duret 在札记中详细记叙了俩人在琉璃厂搜集中国青铜器的经历:

我们在北京不能象在日本东京那样,一次性的做成上百件的成批青铜器交易。在中国就常常只能一件一件地议价,最后总是付出抬高了的价格。我们首先在古董店里浏览一遍,然后慢慢地抬一点价格,最终成功地在专卖店铺里搜寻到一些稀有的青铜器,用以完善我们的搜集。

当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些古老的青铜器时,经仔细查看,发现与我们在日本搜集的很多青铜器相似。那时我们相信是日本人制造,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中国产。这也可以解释日本人

在认识欧洲之前,他们喜欢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

文中间接地反映了日本青铜器商品市场之盛,可以“一次性的做成上百件的成批青铜器交易”。两人在北京购买青铜器时,方才醒悟他们在日本购买的青铜器原来是中国产。这段记叙涉及了日本青铜器来源和中日两国民间的商贸关系。中国青铜器技术早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已经传入日本,历史上日本的佛教铜像也很著名,但与中国商周青铜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塞氏在日本的文物商铺可以批量买到中国产青铜器,无疑说明在日本有很多中国产青铜器出售。日本也有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著名的博物馆,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殷墟考古发掘以后的出土青铜器,晚于塞氏搜集的年代^④。因此日本1870年代文物商铺批量发售的青铜器,涉及清代中叶以来中国民间逐渐形成的仿古和伪作青铜器市场,稍后将作考察。日本出售中国青铜器产品也与中日两国民间商贸关系相联系。从16世纪开始,中日两国相继对外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两国没正式邦交关系,只在民间维持商业贸易往来:“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5]卷77,3132}中国产青铜器只有通过民间商贸渠道运往日本。

下面 Duret 进一步详细记叙了他们在187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亲眼所见古董商人出售青铜器的情形:

在北京搜集文物需要很多的专门知识。古玩和文物都分别注明了名称和铭文,并按朝代和皇帝的年号分类,这就需要了解艺术特别繁荣的朝代以及皇帝年号。对于青铜器搜集,有专业书籍提供指导。这些书就在专事买卖的卖主手上,书名叫《博古图》(Pou-Kou-Tou),上面描绘有很多的青铜器物图形。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宋代出版,大约是公元1200年,已经多次翻印。另一本是《西清古鉴》(Le Si-Tching-Kou-Kieng),那是乾隆皇帝时著录的皇宫中的古代青铜器目录。

中国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古代,始于公元前1700—1100年,它的真实性毫无疑问。青铜器上刻有象形铭文,这种文字已经长时间地停止使用,这些著录青铜器的书用现代文字描述。商代的青铜壶最古老而最受行家的欣赏,我们购买了一批在形式上具有特征的青铜

器。^{[4]120-126}

文中提到了北京古董商指导顾客购买青铜器的情景：“有专业书籍提供指导”。卖者手执宋代的《博古图》^⑤和清代乾隆皇帝时著录的《西清古鉴》^⑥，提供顾客比照图录，按朝代和皇帝年号供买家辨析各种青铜器的时代和款式。文中还提到当时青铜器买卖市场上的热点：“商代青铜壶最古老也最受行家欣赏。”这段记叙北京琉璃场文物商店出售青铜器方式的文字，无疑是西方人眼中有关中国 19 世纪下半叶的文物市场的最早见证。

总括以上 Duret 有关塞氏在北京搜集青铜器的记载，主要提供了下列信息：在日本的古物市场有大量的中国青铜器出售，上海和扬州也有青铜器市场，北京琉璃场的青铜器买卖井然有序，塞氏成功地搜集了一些有价值的青铜器。这一切都说明了塞氏 1871 年末到 1872 年上半年在日本和中国居留期间，中日两国民间青铜器买卖市场的繁荣。Duret 记叙中提到在北京文物市场看到的宋代《博古图》和清代乾隆中期编撰的《西清古鉴》两书，前者涉及了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皇宫青铜器仿古历史，后者反映了中国清朝自嘉庆道光以来的民间青铜器仿古与作伪市场。

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宫廷仿造商周青铜器的传统，早期仿古从宋代《博古图》的出现开始。《博古图》辑录了宋代前朝的青铜器，也导致了宋代宫廷的青铜器仿古，继之民间也出现了精湛的仿铸工艺匠师和作坊：“其仿制之佳者，可与古器等，虽精于鉴赏者，亦无法辨别其真伪。”^{[6]11}宋代宫廷搜藏青铜器也影响到了民间，见证私人著录和收藏古代青铜器有名的是李清照夫妇编著的《金石录》，两人曾辑录众多相关资料并购买收藏青铜器，涉及“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后来靖康之乱南渡，李清照遗弃众多书籍珍藏，但尚留“三代鼎彝十数事”^{[7]215}，足见宋代收藏青铜古器之风的盛行。元代和明代沿袭宋代，宫廷多有青铜器仿古。清代乾隆时期《西清古鉴》载录青铜器数目更大，最早对清代皇宫内府 1176 件有铭古代青铜器予以甄别的是容庚。容庚 1925—1927 年参加故宫文物整理，上述铸有铭文的古代青铜器见于乾隆时期编撰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乙篇和《宁寿鉴古》四部书所著录。经过仔细鉴别，容庚认为其中仿造与可疑的占 490 件^⑦。

晚清以来的青铜器仿古与作伪和塞氏搜集的青

铜器的真伪有直接关系。据有关研究著述介绍，民间工匠艺人仿古或作伪的青铜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中国各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地域分，有“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但各地仿古与作伪历史长短不一样。苏州自元代开始青铜器仿造已经发达，清末民初多仿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器物。山东潍县青铜器仿古大约已有 400 年历史，清中叶以来的“潍县造”仿古青铜器，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青铜器的特征。“西安造”则以在真器上刻伪铭著称，在 20 世纪初最盛。“北京造”民间仿古作伪与外国人对青铜器的爱好有关，多系伪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⑧。从时间上看，青铜器作伪的“西安造”和“北京造”都晚于塞氏在北京搜集青铜器的 19 世纪下半叶。

根据 Duret 的记录，塞氏在中国的青铜器搜集主要涉及两个区域：东南和北京。他们先是在上海和扬州“收购了一批青铜器”，不排除就是苏州民间仿古的产品，也不排除潍县仿古器，因为潍县民间仿古较早，又有海上运出和京杭大运河运至上海和扬州的水利之便。Duret 在文中提到他们在北京“搜寻到一些稀有的青铜器”。北京的青铜器市场固然不排除有从皇宫王府中流出的真品，但既然皇宫中也多仿古作品，18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青铜器又开辟了民间市场。不言而喻，塞氏在日本和中国搜集的青铜器不乏仿作和伪作，他的搜集也曾在巴黎被讥为颇多赝品。

至于日本商店批量出售的青铜器，不排除与中国民间的仿古青铜器有关，尤其与东南苏州地区的仿古和北方地区潍县的青铜器仿古关系密切。如前所说，一是这两地青铜器仿古历史较早，二是潍县和苏州都有可能经由海路到日本，运输更加便捷。这种假设是否有据，应该有专门家去考察了。本文译介的这一则有关塞氏及其友人 1870 年代在日本和北京搜集青铜器的实录资料，不但见证了民间青铜器仿古与伪作，或许也可以对中日民间商贸关系研究提供有关中国 19 世纪仿作青铜器进出口研究的一条线索。

二 塞氏青铜器搜集的影响

关于塞氏日本中国之行的文物搜集，在法国研究塞氏的一本有关他的传记中对其搜购的物品有如下简略介绍：“塞氏的搜集品中有青铜器，8 世纪的丝绸艺术品和陪葬品，公元 3 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的陶器, 波斯的青铜器, 一尊 18 世纪的观音佛像和一些书法作品。”^{[2]197} 上面所提到的塞氏搜集品中的各种珍贵之物, 青铜器被首先提及, 显然是最重要而数目又最多的搜集品, 其中还提到了“一尊 18 世纪的观音佛像”。实际上塞氏在马赛登陆时带回了 4000 余件物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其影响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是青铜佛像, 并非只有一尊。有关塞努齐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影响的研究尚属少见, 本文搜集有关资料作一考察。

塞氏的青铜器收藏打破了 19 世纪下半叶日本浮世绘在巴黎独领风骚的格局。18 世纪的巴黎曾经是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 Chinoiserie(中国风)以及中国文化风靡的时期, 但 1867 年日本浮世绘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大获成功, 日本绘画受到了初期印象画派的欢迎。日本浮世绘以大自然为主的主题和轻盈的画风与西方绘画截然不同, 日本绘画用单纯的手法而使构图和色彩都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 这与法国画坛正在兴起的印象派技巧方面的某些要素契合, 因此在以印象画派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家中, 对日本艺术风格的推崇占了上风。印象派早期画家马奈在他的《西班牙舞娘》(1862) 绘画中就明确提到自己受日本版画的影响: “Le japonisme, l’hispanisme, voila mes sourcee. Mais mon but, c’est la peinture modern. (日本风格, 西班牙风格, 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我的目的是现代绘画。)”^{[8]192} 马奈在 1868 年为左拉画的一幅肖像画上, 其背景墙上就有一幅日本武士的浮世绘作品。Duret 也是日本浮世绘的崇拜者, 与画家马奈又是好友, 在与塞氏结伴的日本之行中曾搜集了为数不少的日本浮世绘和工艺品^①。塞氏归来的第二年就在巴黎工业展馆举行了一次青铜器展览, 不久又自建一栋大楼存放所搜集的青铜器。自此塞氏的中国青铜器在巴黎有了一个供客人和艺术家观瞻的固定地方, 因而在巴黎的作家和艺术家中间传扬开来。塞氏在陈列青铜器的大厅里接待访客, 他的座上客有 Jeanne Hugo(让·雨果), Emile Zola(左拉), Guy de Maupassan(莫泊桑), Alphonse Daudet(都德)等, 印象派画家马奈和莫奈也是他的常客^{[3]23-31}。都德小说 *La Sapho* (《萨福》) 中第一章客厅聚会的描写就是源于塞氏客厅的场面。1882 年, 塞氏决定将搜集的中国青铜器赠与巴黎市政府, 从 1896 年起正式成为以塞氏命名的巴黎市塞努齐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作为

巴黎第一家拥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 在巴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在日本艺术风格正在渗透到巴黎的艺术和工艺美术领域的那个时代, 中国青铜器也以其精美绝伦的艺术造型在巴黎令西方人倾倒。塞努齐博物馆也成为吸引艺术家、汉学家以及爱好中国文化的法国人的心仪之所。

塞氏青铜器搜集另一个最重要的影响, 是对吉美博物馆创始人吉美(Emil. Guimet, 1836—1918) 确立东方亚洲宗教文物搜集思路的启迪。

上文提到塞氏带回巴黎的一尊青铜佛像。据载, 这尊佛像系塞氏“在日本东京一座因一场大火被毁的寺庙外发现的遗弃物, 他把它常年置于大厅里靠窗的地方, 有朋友来访总会得意地为其介绍”^{[3]23-31}。考察塞氏日本之行时的日本历史背景, 塞氏这尊“捡来”的青铜佛像来历并不那么简单, 其实它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佛毁寺的政治思潮有关。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初期, 为了创立天皇制度的神道, 曾出现过神佛分离、烧毁佛寺的暴烈行动。据相关资料介绍, 当时日本的佛教遭遇了历史上的厄运: “为了创立近代的天皇制国家, 确立了国家神道的统治地位。于是京都的平安神宫、奈良的橿原神宫和吉野神宫等应运而生。相反, 日本各地的佛寺则处于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状态。就连以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建筑而闻名于世的法隆寺也难逃厄运, 佛教寺院被彻底压制……佛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②; “神佛分离令的颁布, 使奈良时代末期形成并被一直延续下来的神佛调和的传统被否定, 废佛毁释运动使佛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③。塞氏抵达日本时正逢这股废佛毁寺潮流期间, 如上所言, “佛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塞氏在东京郊外大火烧毁过后的佛寺的路旁捡到的“一具废弃的青铜佛像”, 无疑是佛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的一例。这与法国 1879 年大革命时, 全国各地都有教堂被革命者烧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塞氏的日本青铜器搜集品中, 不乏日本近世的青铜佛像。

塞氏的日本青铜佛像搜集, 深刻地影响了吉美博物馆早期的东方宗教文物搜集。吉美作为继承父业的法国里昂工业家, 1865 年去埃及旅游时, 就被埃及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所吸引, 并对东方古代文明产生兴趣。他主张, “如果真要推崇古代或者异域的文明, 就应该亲历其中……必须通过旅游去接触它的宗教信仰”^[9]。显然, 吉美的观点正好契合了塞氏

在日本和中国的青铜器搜集。1876年4月,吉美得到法国政府委托,步塞氏的后尘去日本、中国和印度考察东方亚洲宗教,他的行程与塞氏东方游历的路线相合。在日本,吉美搜集了300幅佛教图像和600件有关佛教的雕塑和雕刻。在当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佛教处于被废弃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吉美以法国政府使者的身份在一些寺庙会见佛教徒,还在京都和SHINTO的不同寺庙里会同佛教人员,组织了一些佛教仪式。吉美归国后,在1878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将自己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佛教搜集品命名为《远东宗教》展出,并于1879年在里昂成立了吉美博物馆,这就是吉美博物馆在后来的发展中以搜集和汇集有关东方宗教文物著称的缘起。今日巴黎吉美博物馆尚拥有一个日本青铜佛像馆,它搜集的东南亚石刻佛像雕塑亦举世闻名。这不能不令人追溯佛教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遭受的厄运,巴黎最早的青铜佛像就来自那个时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尊塞氏从东京郊区大火烧毁后的寺庙旁“捡来”的青铜佛像。与塞氏相比,吉美东方之行以搜集东方古老宗教文物的目的更明确。他在日本对佛教文物的搜集和对被冷落的佛教的支持以及在寺庙会同佛教徒举行的佛教仪式,远比塞氏在日本搜集青铜佛像的影响大得多,但塞氏是搜集日本青铜佛像并送往西方世界的始作俑者。无疑,塞氏在搜集东方宗教文物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吉美的佛教绘画、佛教文物和青铜佛像的搜集。有法国学者曾提及塞氏对吉美东方之行的影响,但对这一层意义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注意^①。

三 余论

塞氏在187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的远东之旅中,

能够慧眼识得中国青铜器的价值,笔者以为与1850年代以来欧洲对埃及的考古发掘影响有关。塞氏在日本与中国搜集中国青铜器的年代,正是西方社会的考古学科兴起的时代。1870年代前后的巴黎是古埃及考古发掘文物展览中心,很多人都因此被吸引去了埃及游览^②。与那个时代发掘的古埃及文明相比,中国的商周青铜器同样代表了一个古老而遥远的文明,这对塞氏从考古意义上认识中国青铜器的价值不会没有启发意义。或许可以说,中国青铜器搜集与古埃及文物搜集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从艺术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青铜器所承载的宗教意义,无论是商周时期作为祭祀礼器的青铜器,还是后世的青铜佛像,都对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提供了直接的认识。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审视中国青铜器,它们既是宗教文物,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因此塞氏的青铜器搜集在他的时代能够很快传播开来,使中国青铜器从此在西方世界成了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这与中国青铜器所蕴含和代表的丰富内涵不无关系。因此,塞氏的青铜器搜集在文物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塞氏及其友人Duret在1870年代,作为巴黎公社的参与者,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而远遁巴黎游历东方,因此反倒成就了塞氏搜集中国青铜器文物的事业。塞氏的同行者Duret从东方归来以后,致力于印象派画家与日本浮世绘作品的关系研究,成就不菲。简而言之,塞氏与其友人Duret的日本中国之行,令他们都成了与东方文物和艺术结缘的专门家。

注释:

- ① 雅克·布洛斯《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李东日译自《发现中国》,Paris,1981年版,见张西平主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40页)一文介绍了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中,日本参展的浮世绘作品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自那以后法国开始有了东方艺术的民间收藏,其中提及塞氏的青铜器搜集。
- ② 朱凤翰在其专著《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提到了塞氏的青铜器搜集。曹玮、王辉《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中也指出了朱凤翰一书“第二章论及西方(指欧洲与北美及澳洲)搜集中国青铜器当始于法国赛尔努什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
- ③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Michel Levy, France, 1874. 该书以作者与塞氏在东方各国的游历为主线,考察了19世纪下半叶东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2006年该书在法国再版。其中记叙在中国游历的部分被收入 *Le voyage en Chine*, Ninette Boothroyd Muriel Détrie, Robert Laffont, France, 1992, pp. 1200-1206.
- ④ 如众所周知的东京白鹤美术馆即以青铜器收藏闻世,计有商周青铜器达千余件,主要有1926年洛阳郊外唐墓出土青铜器与1928年殷墟出土青铜器。

- ⑤《博古图》是北宋官方书籍,书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周到秦汉的青铜古器 839 件,该书刻于宣和年间(1119—1125 年)。
- ⑥乾隆十六年(1751)编纂的《钦定西清古鉴》甲乙编四十卷,收录商周至唐代青铜器 1529 件。
- ⑦见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1929 年第 5 期)。上世纪 30—40 年代,著文提出青铜器辨伪问题的还有徐中舒《论古铜器之鉴别》(《考古社刊》1936 年第 4 期);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1938 年 3 卷 2 期),以及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下编(1941 年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青铜器辨伪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文物考古界也是热门议题。
- ⑧丁孟在《中国青铜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一书中较系统地对中国历代青铜器的特点与仿作,以及清代以来的民间青铜器作伪做了详细梳理,可做参考。
- ⑨Duret 出身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富裕家庭,与印象主义画派先驱画家马奈成为好友,并由此认识左拉。1867 年 Duret 来到巴黎,以艺术评论记者的身份进入艺术家圈子。Duret 对 1867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日本浮世绘产生了强烈兴趣,同年出版了《法国画家 1867 年》一书。
- ⑩茂木雅博《日本的博物馆》:“这篇文章,是日本茨城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博物馆学专家茂木雅博先生应俞伟超馆长的请求写的”,该文写于 1988 年。引自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网》,2007 年 8 月 1 日。
- ⑪茂木雅博《日本的博物馆》,该文注⑧注明系源自圭室文雄《神佛分离》一书,教育社 1986 年版。
- ⑫参柯安娜《巴黎收藏的中国画》,载杜大恺《清华美术》卷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⑬19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末,即塞氏搜集中国青铜器的前后,法国异域考古发现捷报频传。继 1845 年法国对尼尼微文明遗迹的成功发掘,1850—1880 年间法国参与埃及考古,对古代神庙和古墓的发现与发掘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异域古代文明发掘文物运回卢浮宫展出,在巴黎社会影响甚大。埃及成了法国人向往游历的国度,如本文中的 Duret 1864 年访埃及,吉美 1865 年也去过埃及游历。

参考文献:

- [1] Gilles Bégin. *Henri Cernuschi (1821 - 1896), Voyageur et collectionneur* [G]. Paris: Paris-Musées, 1998.
- [2] André de Fouquières. *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 Le quartier Monceau* [M]. Paris: Pierre Horay, 1954.
- [3] Michel Maucuer. *Voyageur et collectionneur* [G]. Paris: Paris-Musées, 1998.
- [4] Théodore Duret. *Voyage en Asie* [M]. Elibron Classics, France, 1874, 2006 (重版).
-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6] 赵汝珍. 古玩指南全编[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 [7] 徐北文. 李清照全集评注[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
- [8] Sous la direction de Dominique Spiess. *ENCYCLOPEDIE DES IMPRESSIONNISTES* [M]. Swiss: RDITA Lausanne, 1992.
- [9] Wikipédia. Emile Guimet [DB/OL]. [2010-02-25]. http://fr.wikipedia.org/wiki/%C3%89Emile_Guimet.

[责任编辑:唐 普]